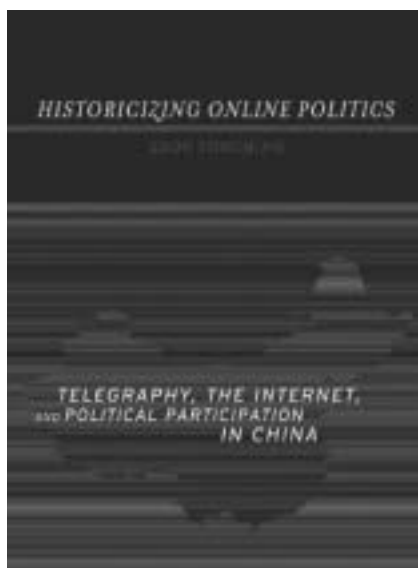


# 解構新媒體的民主神話

## ——評《歷史視野中的網絡政治》

● 孟冰純

網絡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話題。遺憾的是，這其中很大一部分討論都多少帶有技術決定論的色彩，高估了網絡技術超越特定歷史和社會語境的可能。



Zhou Yongming,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歷史上，幾乎每一次傳播技術的突破都會引發一系列烏托邦式的想像。媒介歷史學家道格拉斯 (Susan J. Douglas) 曾這樣描寫二十世紀初

人們對於廣播的熱情：「這種媒介似乎正是長久以來人們所渴望的，真正民主的、權力分散的傳播技術，一種由個人控制，可以隨心所欲使用而不必付費的裝置。」<sup>①</sup>在之後的一個世紀裏，類似的憧憬隨着電視及有線電視的普及而不斷被激活，「無所不在的雙向傳播」(ubiquitous two-way communication) 和「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 的美好前景持續充滿感召力<sup>②</sup>。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無疑將這種烏托邦式的想像推至頂峰，隨着網絡技術的迅速普及，其驚人的信息承載量和前所未有的互動性，加上互聯互通的極大靈活性，都使得人們對這一新技術在經濟、政治、文化各領域可能帶來的變革充滿希望。而對於一眾關注中國問題的觀察家和研究者來說，網絡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則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話題。遺憾的是，這其中很大一部分討論都多少帶有技術決定論的色彩，高估了網絡技術超越特定歷史和社會語境的可能。正如莫斯科

(Vincent Mosco)所言：「賽博空間(Cyberspace)是推動我們這個時代三個核心神話的中堅力量。每一個神話都和對於終點的願景相聯繫：歷史的終結，地理的終結以及政治的終結。」<sup>③</sup>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人類學家周永明的著作《歷史視野中的網絡政治：電報、互聯網與中國的政治參與》(*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以下簡稱《歷史視野中的網絡政治》，引用只註頁碼)，是一部有助於打破上述神話的力作。這本書採用歷史人類學的獨特視角，將史料梳理與田野研究相結合，把相隔一個多世紀進入中國的電報和互聯網技術置於各自的社會歷史背景下，考察了它們與晚清及當代中國政治參與的多重互動。

周永明在導言中即針對中國網絡政治研究中的「怪物情結」提出批評。在眾多西方觀察家的視野中，一方面互聯網像是個仁慈的「怪物」，有望通過不間斷的信息自由流通而消滅專制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中共政權必定把網絡當成洪水猛獸而嚴加防範，但是這個「怪物」非但不可能被馴服，反而會最終改變中國社會。在此類「怪物情結」驅使下作出的政治預言，往往把信息技術和更廣泛的社會背景割裂開來，既高估了技術本身的自律自足，又低估了政權對新技術既加以利用又嚴加控制的能力。這一情結背後更深層的誤區，乃是忽略了「新技術與民主化」的研究範式本身也屬歷史的建構，並且

需要隨着時空背景的變化而被不斷修正。正是基於這樣的反思，周永明獨闢蹊徑地引入了電報與晚清中國政治這一長期被忽略的課題，並以此為參照，把互聯網與當代中國政治的關係放到了一個充滿矛盾和張力的動態歷史背景之中。

本書的第一部分着重討論電報與清末政治參與的互動。電報技術在西方興起後不久，就於1852年由傳教士介紹到中國，但直到1881年大清電報總局才投入商業營運。對於長達三十年的滯後，歷來有兩種解釋。一種說法是，歸咎於儒家思想將科學技術斥為「奇技淫巧」的鄙夷態度；另一種說法是，民間出於對風水的迷信，抵制在田野墓地之間架設電報線。周永明則認為，文化觀念的影響固然不容忽視，但並不足以描繪完整的歷史圖景。首先，晚清的統治階層並非鐵板一塊。道光、咸豐年間就有「經世派」發起學習西方科技的呼籲，之後的洋務運動領軍人物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更是堪稱中國第一批現代知識份子。值得追究的倒是，洋務派的精英為何未能在更短時間內說服朝廷採用電報技術。其次，風水思想從來就沒有被正統儒學接受，往往被統治者貶為「無稽之談」乃至「妖言惑眾」，所以也不足以構成決定性的障礙。

周永明提出，對於「權」和「利」的考量才是影響電報在中國的發展軌迹更為重要的因素。所謂「利」，包括利益、收益、資源等多重意思，「權」則既指權利、權力，也指控制力。雖然英、美、法、俄等國從1861年開始就頻頻要求在中國架

本書採用歷史人類學的獨特視角，將史料梳理與田野研究相結合，把相隔一個多世紀進入中國的電報和互聯網技術置於各自的社會歷史背景下，考察了它們與晚清及當代中國政治參與的多重互動。

周永明在書中強調指出，對「權」和「利」的衡量，是晚清以後的中國統治者不斷需要面對的問題，對於這兩方面的評估及應對從而也影響着新技術在中國的發展軌迹。

設電報網絡，但起初清政府一方面把中西利益之爭看成一場零和遊戲，低估了此項技術可能給本國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擔心引入此項技術後無法控制可能引發的外交糾紛。隨着洋務派對西方技術的了解不斷加深，在朝廷的勢力日益加強，電報有「利」的一面也更加凸顯。1874年日軍以琉球漁民被殺為藉口出兵台灣，更是令統治者意識到通訊之重要性的一個契機。對電報的商業及軍事用途的重新估價，終於促使清政府於1881年下決心建設完全由本國掌控的電報網絡。周永明在這裏強調指出，對「權」和「利」的衡量，是此後的中國統治者不斷需要面對的問題，對於這兩方面的評估及應對從而也影響着新技術在中國的發展軌迹。

當然，統治者既欲求「利」，又想保「權」的過程總是充滿了矛盾和衝突，在特定歷史時空下，新的傳播技術被甚麼樣的人群如何利用，往往出人意料。也正因為如此，在紛繁的史實面前，帶有先驗論或決定論色彩的解釋模式顯得軟弱無力。《歷史視野中的網絡政治》從大量史料出發，全方位地勾畫出清末中國社會對於電報的「接受語境」(receiving context)，這其中，技術的因素始終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乃至主體的能動性相互影響、相互轉化。

與當代的互聯網控制類似，清政府也試圖從網絡、服務和內容三方面對電報進行管理。清政府設立了商電局和官電局，分別管轄私營和官方的電報網絡。1881年大清電報總局成立後，理論上所有電報服

務都應該通過中國人控制的陸上電報線，但是由於上海和香港之間的海底電纜早在1871年就由丹麥大北公司鋪設完成，沿海及海外的精英階層完全可以繞過官方控制，經由私營公司拍發電報。就內容而言，晚清電報有明確的「官」、「私」之分，前者享有服務優先權，巡撫以上級別的官員可以簽條拍發。

今日中國互聯網以防火牆而聞名，而事實上，當年的清政府也曾經直接下令電報總局，將特定內容的電報扣留不發。但正如「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從來都是充滿滲漏一樣，電報技術也不可能完全為朝廷掌控。本書將晚清電報與政治的關係演變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一、從1881到1894年，清政府主要利用電報加強轄區內的統治；二、1895年以後，「通電」開始被視為政治表達和參與的重要工具；三、從1905到1911年，電報在全國性的政策討論和政治發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謂「通電」或「公電」是指同時發送給多個接收者的明碼電報，是清末中國社會個人、團體，乃至政府機構發表意見的獨特方式；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這些電報只有被報紙轉載才能獲得廣泛影響。作者通過對1872到1912年間，以《申報》為主的新興商業報紙的內容梳理，有力地論證了電報與報紙的互動是如何促進晚清縉紳階層參政議政的。

書中提到，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之後，《申報》刊登了一份署名全台紳民的通電，反對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宣布忠於清政府，並籲請國際社會干預。1898到1900年的保

皇運動期間，士紳階層正是有效地利用了通電這一形式表明政治立場，影響公共輿論，從而有效地對慈禧太后施加壓力，迫使其最終放棄了廢黜光緒帝的計劃。儘管當時很多維新派人士在百日維新失敗後流亡海外，但電報這一新興通訊方式為他們創造了在全球範圍內有效參與政治的便利條件。1900年慈禧太后支持義和團對外國人的襲擊，於6月向一切在華外國勢力宣戰。東南地方官員震驚之餘決定不支持這一行動，時任大清電報局總辦的盛宣懷利用職位之便，成功地組織了東南地方督撫進行東南互保運動。運動期間，地方官員通過控制電報網絡，既能彼此間及時通報信息，又在必要時阻止公眾及朝廷了解全部實情，有效地操縱了輿論。

而在1905年興起的收回鐵路權運動中，電報對於政治參與的推動更是達到了新的高度。首先，參與討論的群體明顯擴大。從《申報》刊登的大量通電可以看出，當中有鐵路公司股東、海外華人、國內官員及學生以個人名義發給清政府各部門的；有以公司、商會、教育聯合會等團體名義發送的；更有清政府各部門與各級督撫之間就鐵路權問題進行溝通的公務電報。其次，電報所提供的已經不僅僅是公開表明立場的手段，它更通過和報紙相結合，進一步成為協商討論的平台，幫助私人控股的鐵路公司首次真正參與政府的決策過程。另外，在收回鐵路權引發的一系列爭議中，政府部門間的公務電報也被刊印在報紙上，使得各方的立場都公之於眾，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

從引進電報前對於「權」和「利」的考量，到清政府試圖對新通訊手段加以控制，再到通電借助報紙發揮影響力，為晚清的政治參與創造了短暫的黃金時期。作者借助這段歷史說明，技術本身不足以成為社會變化的根本動力，問題的關鍵在於能動主體 (agency) 出於甚麼目的，又如何利用這項技術。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主體所處的特定歷史背景：清朝末年朝廷權力衰弱，地方上新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力量崛起，加上在內憂外患之中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些都極大促進了政治參與。

如果說晚清電報發揮的政治功用如今已鮮為人知，互聯網則從一進入中國就被寄予「民主化」的厚望。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William J. Clinton) 2000年發表的著名論斷，將中國的網絡監管比作「把果凍釘上牆」<sup>④</sup>的徒勞努力，就很能代表相當一部分西方觀察家的樂觀態度。但到了2006年，微軟 (Microsoft)、雅虎 (Yahoo) 及谷歌 (Google) 三大網絡巨頭因為配合中國政府的網絡審查而受到國際人權組織及廣大「自由衛士」的強烈譴責，烏托邦的理想一時間又走到了反面。在美國兩位法學教授格爾斯密 (Jack Goldsmith) 與吳修銘合著的《誰控制互聯網？》(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 一書中，指出中國政府似乎再次以全知全能的暴君面目出現，網絡的民主潛能在專制政權下顯得岌岌可危<sup>⑤</sup>。周永明的《歷史視野中的網絡政治》正是要打破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通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及內

作者認為技術本身不足以成為社會變化的根本動力，問題的關鍵在於能動主體出於甚麼目的，又如何利用這項技術。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主體所處的特定歷史背景。

對於國家政權而言，由於從「左」到「右」的各種言論都在通過互聯網尋找一席之地，眾聲喧嘩之中如何有效地維繫言論控制，無疑是統治者需要面對的難題。

容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還原了個體在控制與反控制的權力博弈之中的能動性。本書的第二部分主要提供了三類網站的個案研究：知識份子創辦的網絡雜誌、民間作者的政治寫作，以及民族主義色彩濃重的軍事網站。

較之清政府採納電報技術時的猶疑不決，中共從一開始就對互聯網抱十分積極的態度，堅信這項技術將會極大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周永明指出，中共把互聯網看成眾多媒體的一種，一方面盡力拓展其科技和商業價值，另一方面試圖通過對基礎設備、服務和內容的控制，消解潛在的政治威脅。回顧互聯網在中國的高速發展歷程，政府的積極作用不容忽視。無論是對於體制內的知識份子還是體制外的民間作者，互聯網都為他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正如民間作者之一呂加平所言：「如果不是互聯網，大概我的聲音永遠不會有人聽到。」（頁181）但即使在這樣的空間，技術本身的變革力量仍始終處於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及能動主體的調和之下。就學術性的網絡雜誌而言，創辦者的立場不可避免地對雜誌導向產生影響，知識份子群體原有的幫派自然會轉移到網上論爭當中，這從「思想的境界」網站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和「思想格式化」網站的民族主義傾向均可見一斑。

絕對平等、理性、兼容並包的討論，在現實世界裏難以實現，而在虛擬空間裏同樣面臨重重障礙。書中提到2000年長江讀書獎引發的網上爭論，認為參與討論的知識精

英固然對新的自由言論空間投入了極大熱情，但爭論過程中不時出現的人身攻擊乃至謾罵，似乎距離「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理想仍相去甚遠。其次，維持學術性網絡雜誌的費用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比如在營辦「思想格式化」網站的過程中，一個問題始終困擾着創辦人，那就是如何在不依賴商業廣告的情況下獲得財務保障。相比較而言，「世紀中國」網站既有中國社會發展網的官方資金支持，又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協辦，堪稱學術網站中的精英。這種精英地位更通過一批著名學者的參與而得以強化，因而迅速和其他的「同人雜誌」拉開了檔次。當然這也同時意味着，網站的學術性和理論性導向限制了非知識精英的參與。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世紀中國」網站曾一度是中國學術網站的一面旗幟，但就在周著出版後不久的2006年7月，該網站及其所屬論壇被官方強行關閉，網站主編最後留言道：「在六年之中，雖然我們歷經無數外人所不知的艱辛困苦，我們學習在堅持中妥協，在妥協中堅持，曾度過了許多危機的關頭。但今天，仍然劫數難逃。」<sup>⑥</sup>這段話無疑再次為技術潛能與政治體制的關係添上一個註腳。

對呂加平、吉安和安替三位網絡政論家的探討，再次體現了周永明自如地對田野研究的材料進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能力，同時構成本書又一饒有趣味的章節。儘管三人的生活背景和政治主張各不相同，周永明用「民間」一詞概括他們「邊緣化」的生存狀態——

這些因網絡而成名的政論家既和官方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又遠離主流知識份子群體。這種體制外的身份注定是模糊游移且充滿矛盾的。呂加平強調自己是非官方的研究者，但他並不介意通過種種官方途徑擴大影響，尋求更大範圍內的認可。而即使是一貫標榜反體制立場的安替，仍然感嘆他的寫作為「主流」所輕視，對「邊緣化」的生存狀態深表焦慮。

對於國家政權而言，由於從「左」到「右」的各種言論都在通過互聯網尋找一席之地，眾聲喧嘩之中如何有效地維繫言論控制，無疑是統治者需要面對的難題。在周永明看來，中國政府應對網絡學術雜誌以及民間作者表明，國家機器仍在不斷摸索在新環境下行之有效的治理 (governance) 策略。隨着技術的發展，這些策略會變得更加靈活，但也無可避免地帶有縫隙和漏洞，從而使拓展新的話語空間成為可能。

至於主流知識份子與民間作者的關係，同樣充滿張力。較之清末利用通電參與政治的士紳階層及商會組織，今日的「民間」資源更加貧乏，影響力也很有限。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多半並不認可呂加平、安替這樣的人，雖然也有少數知識界名流號召向民間作者投以更多同情和關注，但在周永明看來，這樣的號召從精英主義立場出發，並未充分體察民間政論家的銳氣和勇氣。

民族主義與政治參與的互動，是本書貫穿始終的一個話題。晚清電報的政治影響和當時救亡圖存的普遍情緒密不可分，新技術的採納

正是藉由民族主義強化了其合法性。而當代中國互聯網與民族主義，也隨着一場場國際風波，成為海內外輿論界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sup>⑦</sup>。通過對軍事網站的個案研究，周永明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新的闡釋。他認為，從「鐵血」網站上頻頻出現的關鍵詞，比如「綜合國力」、「國家利益」、「遊戲規則」等，可以看出參與討論者對於國家間的力量角逐已經有了相當理性的認識。對於多數網友來說，國與國的爭鬥已不再是充滿感情色彩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利益驅動的遊戲，軍事力量是遊戲制勝的關鍵。另外，從論壇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也可以看出，參與討論者掌握了大量與軍事有關的信息，他們的民族主義因而建立在了解時事的基礎上，並非盲目衝動。這樣的解讀，無疑反駁了西方通行的觀點，認為中國網民的民族主義完全是非理性的，是長期受政府意識形態灌輸的結果。

《歷史視野中的網絡政治》憑藉對社會政治背景的深刻洞察，通過生動翔實的第一手材料，論述了信息新技術如何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推動中國的政治參與。本書的理論貢獻大致有以下幾方面：首先，對於「接受語境」的再三強調，有力地批判了新媒體研究中常見的技术決定論傾向，同時也解構了歷史和地緣政治終結的神話。其次，本書的另一個重要出發點，是反思社會科學中西方中心主義研究範式的局限性。像「網絡能否帶來中國民主化？」這樣的議題本身，就暗含了對於政治參與、民主及中國政治的特

晚清電報的政治影響和當時救亡圖存的普遍情緒密不可分，而當代中國互聯網與民族主義，也隨着一場場國際風波，成為海內外輿論界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我們固然不能把網民想像成盲從的「大眾」，但是政權對於民族主義情緒的默許、助長和利用同樣不容忽視。否則我們似乎無法解釋，民族主義在中國互聯網上尤為突出，相比較自由主義也相對更容易生存下來。

定理解，而這其中不乏站在西方立場上一廂情願的想像，並非總是從事實出發。再次，作者對於宏觀權力結構和微觀能動主體之間動態關係的把握也值得一提。書中強調不同人群應用技術的方式和目的各不相同，能動主體對於新信息的解讀更不可一概而論，比如軍事論壇上突出的「知情的民族主義」(informed nationalism) 就是例證。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權力結構和能動主體之間永遠是充滿辯證關係的。拿網絡空間的民族主義來說，我們固然不能把網民想像成盲從的「大眾」，但是政權對於民族主義情緒的默許、助長和利用同樣不容忽視。否則我們似乎無法解釋，為甚麼在眾多政治傾向中，民族主義在中國互聯網上尤為突出，相比較自由主義也相對更容易生存下來。包括呂加平、吉安在內的「體制外」寫作也並非總是與體制本身的意識形態導向相衝突，反而時時有合謀的可能。在這個問題上，周永明雖然提到國家政權正逐步採用新的信息控制方式，但並未展開論述。新的方式到底新在哪裏，具體如何運作？我們是否能從中導出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框架，從而進一步理解新技術環境下結構與主體的關係？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 註釋

① Susan J. Douglas, *Invent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 1899-192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②③ Vincent Mosco,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1; 13.

④ 克林頓於2000年3月8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 (Paul H. Nitze School for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講話，引自William J. Drake, Shanthi Kalathil, and Taylor C. Boas, "Dictatorships in the Digital Age: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and Cuba", *Information Impacts* (October 2000), [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531](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531)。

⑤ Jack Goldsmith and Tim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⑥ 參見<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B4%80%E4%B8%AD%E5%9C%8B>。

⑦ 近年學界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增多，比如Stanley Rosen, "Chinese Media and Youth: Attitude toward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ed. Chin-chuan Lee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97-118; Xu Wu,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2008年西藏及奧運火炬風波之後，西方主流媒體也對這個問題多有長篇報導，比如Evan Osnos, "Angry Youth: The New Generation's Neocon Nationalists", *New Yorker*, 28 July 2008, [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8/07/28/080728fa\\_fact\\_osnos](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8/07/28/080728fa_fact_osnos)。

孟冰純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體與傳播系講師